

·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 ·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 经济增长展望

——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

张晓晶 汪 勇

摘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内，考察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改革红利”，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5%以上，2035年人均GDP为2.43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 2.42万美元的水平；考虑“三大新因素”后，“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2035年中国人均GDP为2.28万美元，比基准情景减少0.15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左右，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 潜在经济增长率 人口老龄化 新冠疫情 技术脱钩

作者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汪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10）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国际上“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①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制约。国内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大幅攀升至高位，经济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出新的要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因此，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并且，中国只有保持较快增长才能让世界继续分享增长红利，从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延续“东升西降”趋势，为赢得中美“持久战”增加底气。因此，客观评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

过去40年中国以平均4倍于美国的增速创造了“增长奇迹”，未来30年，中国还能以平均2倍于美国的增速实现对美国经济的持续赶超吗？有关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已有不少研究。常规的预测大都认为中国GDP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④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的制约，上述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常规预测将面临严峻挑战，这也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本文尝试将三大制约因素纳入潜在增长率分析框架，对此作出回应。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页。

④ 参见刘伟、蔡志洲：《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黄群慧、刘学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节点的判断和认识》，《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2期；X. Wang, “Openness, Growth Convergence and China’s Development Prospect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13, no. 1, 2020, pp. 82-108; Å. Johansson et al., “Looking to 2060: Long-Term Global Growth Prospects: A Going for Growth Report,”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s, no. 3, 2012.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应用最广泛的是两类模型,即经济收敛模型和增长核算模型。经济收敛模型通常以跨国增长收敛规律为基础,认为不同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具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具体而言,该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 Lucas 提出了经济追赶模型,认为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人均(劳均)GDP 增长率向前沿发达国家(如美国)收敛。^①遵循该思路,白重恩和张琼使用跨国可比经济体样本,测算出 2021—2030 年、2031—2040 年和 2041—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20%、3.67%和 3.22%。^② Wang 在此框架基础上,采用时变收敛率,预测中国 2021—2030 年、2031—2040 年和 2041—2050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6.56%、5.01%和 3.67%。^③其二,跨国数据的统计规律显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率具有向均值回归的趋势。^④ Prichett 和 Summers 认为中国过去高速增长将回归常态,预测中国 2013—2023 年、2024—2033 年潜在经济增速将分别降至 5.01%、3.28%。^⑤朱民等在生产率收敛框架内考虑了行业特征因素,预测 203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3.9%—4.5%之间。^⑥该类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了不同经济体在经济规模、制度环境、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国际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增长核算模型是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陆旻和蔡昉基于加入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测算出中国 2021—2030 年、2031—2040 年和 2041—2050 年中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31%、4.24%和 2.81%。^⑦中国社会科学

① R. E. Lucas,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 no. 1, 2009, pp. 1-25.

② 参见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经济学报》2017 年第 4 期。

③ X. Wang, "Openness, Growth Convergence and China's Development Prospects," pp. 82-108.

④ R. J. Barro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 2, 1992, pp. 223-251.

⑤ L. Prichett and L. H.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2014.

⑥ 参见朱民、张龙梅、彭道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1 期。

⑦ 参见陆旻、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2016 年第 1 期。

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的《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使用经典的生产函数（不含人力资本），测算出中国2021—2030年、2031—2040年和2041—205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20%、4.14%和2.98%。^①增长核算模型的优势是具有较强的经济理论基础，可以分解出不同生产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因而成为各类研究机构和央行预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时经常使用的模型。这类方法的预测结果一致表明，中国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和对美国经济的持续赶超均能够顺利实现。但是，现有研究并未考虑近期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此外，一些研究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因素，测算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例如，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用CGE模型，预测2021—2025年和2026—20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分别达到5.9%和5.0%。^②这类方法虽然对短期预测具有较好适用性，但缺点是模型往往庞大复杂，不同参数的选取和模型设定会导致结果较大变化且难以相互比较，不太适合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基于此，本文从供给侧出发，采纳应用最广泛的增长核算模型，并考虑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等“三大新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重新测算中国2021—205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诸如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等等。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首先，持续增长是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只有坚持以经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②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3.

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才能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持续增长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要实现上述目标，未来 30 年需要完成三个阶段性任务：第一，到“十四五”时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到 2035 年人均实际 GDP 水平较 2020 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到 2050 年人均实际 GDP 水平较 2020 年翻两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②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对于经济增长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了 1.25 万美元，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③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是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再次，持续增长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支撑。中国的高债务问题恰恰是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所致，即债务扩张对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起到了显著支撑作用。但是，债务的长期过快增长会导致负债主体偿债压力过重，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可能触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④近年来，经济增速下行使得高增长掩盖下的发展质量问题“水落石出”，冲击着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数据显示，2008—2021 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从 141.2% 上升至 263.8%，年均提高 9.4 个百分点。受国际局势变化和新一轮疫情的影响，中国宏观杠杆率在 2022 年二季度进一步上升到 273.1%，比上年末增长 9.3 个百分点。面对杠杆率的较快攀升，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推动高质量发展，减少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才能实现稳杠杆和结构性去杠杆。

最后，持续增长是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根本保障。就大势而言，“东升西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⑤但就存量而言，依旧是“西强东弱”。一方面，只有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保持较快经济增长，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4 页。

② 参见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5 页。

④ 参见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⑤ 参见张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1 期。

度的优越性。^①另一方面，只有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让世界继续分享中国增长红利，增强对全球人才、资金、技术、投资等资源的吸引力，为中美竞争博弈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而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三、基准情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为预测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本文采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预测了2021—2050年基准情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对1981—205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动力分解，以厘清各类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此外，为评估预测结果的合理性，本文还将基准情景的预测结果与其他研究做了比较。

（一）理论模型

本文采用加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这种方法考虑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对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这四个要素均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因素有关。根据人口预测数据可以估算出供给侧各生产要素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而测算出经济增长潜力。虽然短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是从长期看，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一致。基于这种方法估算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该生产函数形式为：

$$Y_t = A_t K_t^\alpha (h_t L_t)^{1-\alpha} \quad (1)$$

其中， Y_t 表示实际 GDP， A_t 表示 TFP， K_t 表示资本存量， L_t 表示劳动力数量， h_t 表示人力资本。借鉴陆旻和蔡昉的方法，^② 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表示为：

$$\frac{\Delta Y_t^*}{Y_{t-1}^*} = \left[\frac{\Delta A_t}{A_{t-1}} + \hat{\alpha} \frac{\Delta k_t}{k_{t-1}} + 1 \right] \times \left[\frac{h_t L_t^*}{h_{t-1} L_{t-1}^*} \right] - 1 \quad (2)$$

其中， $\Delta Y_t^* / Y_{t-1}^*$ 为第 t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k_t = K_t / h_t L_t$ 为第 t 年附加人力资本的资本劳动比， L_t^* 为第 t 年的潜在就业量， $\hat{\alpha}$ 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值。^③ 公式（2）表明，潜在经济增长率受到四个因素影响：TFP 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潜在就业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结构变化会通过直接

- ① 参见高培勇：《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日报》2022年7月19日，第12版。
- ② 参见陆旻、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2016年第1期。
- ③ 关于资本产出弹性 $\hat{\alpha}$ ，本文除了使用中国历史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校准之外，也考虑了双碳目标、共同富裕、债务高悬等因素的影响，最终选取为 0.55。

和间接的渠道影响后三个因素。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1. 历史数据

1980—2019 年的实际 GDP (Y)、实际资本存量 (K)、劳动力 (L) 和人力资本指数 (h) 均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 (PWT10.0), 资本回报率数据来自白重恩和张琼^①的研究。

2. 2020—2050 年人口预测值

2020—2050 年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19)》(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②本文选取了人口预测数据中的两个方案, 分别为中等生育率方案 (基准情景)、低生育率方案。总和生育率 (TFR) 水平决定了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发展状况, 不仅影响未来的劳动力数量, 还会影响人口抚养比。中国在低生育率方案、基准情景下的人口峰值时间分别是 2024 年、2027 年, 其对应的人口峰值数分别为 14.47 亿人、14.55 亿人。

3. 2020—2050 年资本存量预测值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 即 $K_t = I_t + (1 - \delta_t)K_{t-1}$, 其中, K_t 为第 t 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 I_t 为第 t 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 δ_t 为第 t 年的资本折旧率, 取为 5%。当期资本存量由初始资本存量和此后历年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共同决定。新增固定资本形成率会受到人口抚养比、资本回报率以及税率等因素影响。

4. 2020—2050 年潜在就业预测值

潜在就业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 15 岁以上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 而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都是人口年龄的函数。本文参照陆暘和蔡昉的方法,^③ 分年龄和性别来测算中国未来每年潜在就业水平。

5. 2020—2050 年人力资本预测值

人力资本数据来自佩恩表 (PWT10.0) 中提供的人力资本指数, 这个指标主要根据世界各国 15 岁以上的分年龄组 (每 5 年划分) 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教育回报率进行测算。在预测 2020—2050 年中国人力资本时, 本文选取了实现经济赶超的东亚发达经济体, 对应这些经济体历史上与中国 2019 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年份, 再以其对应年份后 30 年人力资本平均年均增长率作为中国人力资本未来一段时间的增长率, 进而计算中国未来每年人力资本。

① 参见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②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9.

③ 参见陆暘、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2016 年第 1 期。

(三) 基准情景预测结果

1. 重要经济指标长期变化趋势

本文估算了未来 3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人均 GDP 的变化趋势（见表 1）。在基准情景下，本文做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考虑到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TFP 增速设定在 2012—2019 年的平均值 1.9% 不变；二是，TFR 保持在 1.69 不变。结果显示，“十四五”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位于 5% 以上。2022 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为 5.32%，到“十四五”末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至 5.16%。从 2026 年开始，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降至 5% 以下，2035 年的潜在经济增速为 4.16%，而到 2050 年，潜在经济增速预计降至 2.87%。不过，即使 2026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降至 5% 以下，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仍能达到 2.43 万美元，届时中国人均 GDP 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42 万美元）。^①

表 1 基准情景下 2021—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	人均 GDP (美元)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	人均 GDP (美元)
2021	5.38	12556	2036	3.89	25292
2022	5.32	13192	2037	3.77	26342
2023	5.27	13860	2038	3.67	27416
2024	5.21	14561	2039	3.56	28515
2025	5.16	15297	2040	3.46	29637
2026	4.96	16046	2041	3.26	30755
2027	4.90	16829	2042	3.18	31899
2028	4.84	17648	2043	3.12	33077
2029	4.77	18504	2044	3.07	34294
2030	4.71	19397	2045	3.04	35555
2031	4.53	20305	2046	2.96	36844
2032	4.45	21248	2047	2.93	38181
2033	4.36	22223	2048	2.91	39568
2034	4.26	23229	2049	2.89	41008
2035	4.16	24267	2050	2.87	42501

注：人均 GDP 采用 2021 年美元不变价。《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显示，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了 80967 元，折合为 12556 美元。

2.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动力分解

^① 2021 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是人均 GDP 达到 2.3 万美元。通过对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的测算，2011—2020 年发达经济体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的中位数为 0.36%。基于此，本文将中等发达国家未来 15 年人均 GDP 的增长率也假定为 0.36%，从而推算出 2035 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为人均 GDP 2.42 万美元。

为反映各类生产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变化趋势，本文对 1981—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动力分解。图 1 显示，2008 年以来，资本存量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超过 50%，而 2011 年前后 TFP 对经济潜在增速的贡献明显下降。同时，劳动力数量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大幅降低，由 1981—1985 年的近 20% 降至 2016—2020 年的不到 1%，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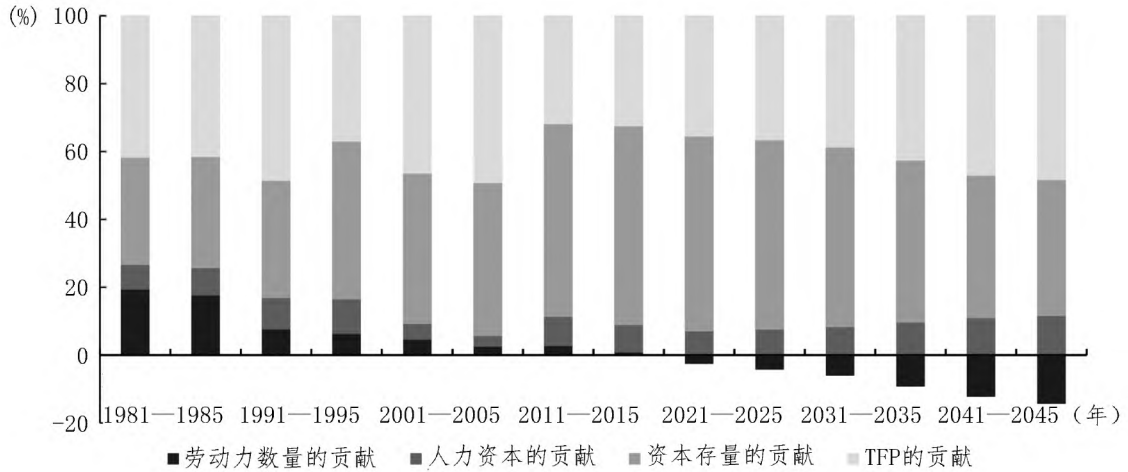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动力分解 (1981—2050)

伴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持续减少，劳动力供给也不断下降，导致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负，且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图 1 显示，“十四五”时期劳动力数量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贡献为 -2.52%，而到 2046—2050 年这一负向影响将扩大到 -14.28%。与此不同，TFP 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逐步扩大。在“十四五”时期，TFP 的贡献率为 38.18%，到 2046—2050 年有望达到 62.76%。这表明，科技创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体现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存量在很长一段时期 (2021—2035) 仍是中国经济保持较高水平潜在增长率的最重要动力，贡献率持续超过 50%。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要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需持续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从人口因素来看，人力资本的上升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不利影响。尽管人力资本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较小，但其影响却在持续扩大，贡献率从“十四五”时期的 6.99% 上升到 2046—2050 年的 11.5%。

3. 预测结果比较

本文预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白重恩和张琼^①相比下降速度更为均匀 (见表

① 参见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经济学报》2017 年第 4 期。白重恩和张琼分别选取 Maddison 和 PWT9.0 两套数据测算了 2016—2050 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表 2 所列为二者的平均值。

2), 主要区别在于本文采用了增长核算模型, 而后者使用了基于技术溢出的经济追赶模型。尽管本文与刘伟和范欣^①均采用了加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 但由于本文采用了最新数据 (PWT10.0 和《世界人口展望 (2019)》) 估算相关参数与就业人数, 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信息、新情况和新变化, 导致预测结果低于后者。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 (2020)》总报告组,^② 本文的预测结果明显偏低, 原因在于: 其一, 本文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了人力资本因素; 其二, 本文对 TFP 增长率的设定 (1.9%) 要明显低于后者 (2.86%)。不过, 本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③的预测结果较为接近, 这主要是因为采用的测算方法相似; 但 2021—2050 年中国人口数据, 本文采用了《世界人口展望 (2019)》, 而后者使用了王广州^④的预测结果。总体而言, 尽管由于采用数据、预测方法不同, 本文基准情景预测结果与已有研究略有差异, 但在预测数值和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

表 2 多项研究预测结果的比较 (2021—2050)

时间段	本文基准预测	白重恩和张琼 (2017)	刘伟和范欣 (2019)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 (2020)》 总报告组 (2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2020)
2021—2025	5.27%	5.57%	7.29%	5.42%	5.51%
2026—2030	4.83%	4.82%	6.97%	4.92%	4.88%
2031—2035	4.35%	3.94%	6.49%	4.48%	4.37%
2036—2040	3.67%	3.40%	—	3.96%	3.92%
2041—2045	3.13%	3.46%	—	3.58%	3.30%
2046—2050	2.91%	2.98%	—	3.35%	2.67%

资料来源: 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 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经济学报》2017年第4期; 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 (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四、中国中长期增长面临新挑战

在基准预测结果基础上, 本文考虑了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技

- ① 参见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 (2020)》总报告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④ 参见王广州:《新中国70年: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老龄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3期。

术脱钩等“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对于每一种情景，本文先从经济理论上分析该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机理，再基于影响机理设定对应的预测情景，最后预测该情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一）人口老龄化加速

老龄化加速在时间上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倒 U 型”特征。快速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有一些提振作用，但长期将严重制约经济增长。过去 40 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年均达到 2.72 个百分点，但该正向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消退。^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人口峰值提前到来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投资、TFP 等渠道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第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随着中国人口峰值提前到来，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具有实际劳动能力人口减少。而抑制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但会增加 15 年后的劳动者数量。第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低生育率常常伴随着大量“小家庭”的出现。与生育更多的子女相比，父母会在这些更少的子女身上投资，从而快速提高年轻人群的人力资本。但由于年轻人口占比下降，国家整体人力资本提升速度减缓。第三，对投资的影响。生育率下降能够减轻少儿抚养的负担，增加储蓄水平，提高物质资本积累，从而带来人口红利。^②同时，人口老龄化不仅增加了养老资金支出，也使得长期看护、医疗保障等赡养成本增加，^③挤占了生产性资本投资。第四，对 TFP 的影响。科技创新对从业人员具有明显的年轻化要求，尤其是航空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年轻劳动力增长，随着劳动力队伍的大龄化，社会整体创新活力有所下降，抑制 TFP 的持续提升。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出生率下降速率明显超过了 2019 年联合国对中国在基准情景下的人口出生率预期，这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比预期更快。有学者认为，中国总人口峰值将在 2025 年前到来。^④与该判断一致，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在低生育率情景下的中国人口峰值在 2024 年出现。基于上述考虑，本文

① 参见王维国、刘丰、胡春龙：《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② A. C. Kelley and R. M. Schmidt, "Aggregat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or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Componen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Demography*, vol. 32, no. 4, 1995, pp. 543-555;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都阳、封永刚：《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经济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④ 参见蔡昉：《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将至，当前重要任务是勿让需求侧制约长期增长》，《企业观察家》2021 年第 9 期。

以低生育率情景来反映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低迷的现实，并以此为基础预测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

相比基准情景，该情景的中国 TFR 明显偏低，2020—2025 年维持在 1.45%，2026—2030 年、2031—2035 年和 2036—2040 年分别降至 1.32%、1.23% 和 1.23%，但此后有所上升，2041—2045 年、2046—2050 年分别提高到 1.24%、1.25%。图 2 显示，2042 年之前该情景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高于基准，两者之间的差距（净效应）呈现“倒 U 型”变化，但在 2042 年之后持续低于基准，且净效应会持续扩大。其内在原因是，低生育率会在中期内降低少儿人口比重，此时会减轻人口抚养比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但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一段时间后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并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上升，进而抑制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会日益增大。例如，2050 年，该情景相比基准情景潜在经济增长率减少 0.66 个百分点。若考虑人口老龄化加速对 TFP 的不利影响，则生育率持续下降会导致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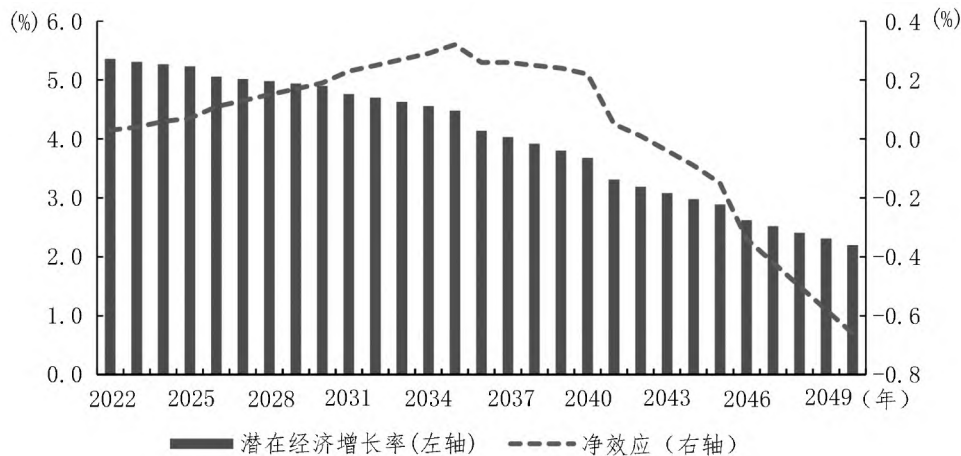


图 2 人口老龄化加速情景下 2022—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及净效应

(二) 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

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疤痕效应”。^① 新冠疫情冲击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TFP 等都会产生深刻影响，由此造成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拖累。首先是对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疫情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疫情造成学校停课，由此带来的教育时间减少将损害人力资本积累。其次是对投资的影响。疫情冲击会对居民和企业信念产生巨大而持久的负面冲击。这种“信念伤痕”会导致个人在家庭财务和投资组合决策中系统性地降低风险，并可能带来持续较高的预

^① J. Kozlowski, L. Veldkamp and V. Venkateswaran, “Scarring Body and Mind: The Long-Term Belief-Scarring Effects of COVID-19,”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439, 2020.

期储蓄和较低的预期投资，从而导致永久性的经济损失。再次是对 TFP 的冲击。一方面是向在家工作转换所产生的调整成本，企业可能会重新设计办公室和商店，以允许更多的社交距离，即使效率较低；另一方面是供应链的调整，例如企业也可能从“及时”库存模式转变为“以防万一”模式，增加库存和更稳健（但效率更低）的供应链。最后是疫情导致“僵尸企业”不断增加，在保市场主体的情况下，企业僵尸化得以“容忍”，但在经济恢复时期，却很难出现反转。这将造成资本错配，损害生产率的提升。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难度和疫情影响的复杂性，本文仅考虑新冠疫情在中长期内降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借鉴 Fernald 和 Li 的做法，^① 假定新冠疫情会使一部分劳动者（55 岁及以上）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其劳动参与率。考虑三种情景：情景 1 假定新冠疫情导致 2020—2024 年 55 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分别下降 1%（55 岁）、1.75%（56 岁）、2.25%（57 岁）、2.5%（58 岁）、2.625%（59 岁）；情景 2 假定新冠疫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为情景 1 的三倍；情景 3 假定新冠疫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为情景 1 的五倍。以情景 2 为例，相比基准，新冠疫情导致 2020—2024 年 55 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分别下降 3%（55 岁）、5.25%（56 岁）、6.75%（57 岁）、7.5%（58 岁）、7.875%（59 岁），2025 年 60 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 7.875%，203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 7.875%，以此类推。对于其他时间段劳动者数量，本文采用插值法补充。

表 3 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会在短期内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其效应会快速减弱。2020—2024 年，三种情景下新冠疫情冲击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 0.32%、0.95% 和 1.54%。以情景 2 为例，新冠疫情使得 2020 年潜在经济增速下降 1.38 个百分点，但到 2024 年其影响降至 0.52 个百分点，此后其影响显著快速下降。这是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最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中老年劳动者年龄增加，其本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在上升，导致新冠疫情通过劳动参与率变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逐渐消失。需要指出的是，若考虑新冠疫情对 TFP 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更多。

表 3 新冠疫情冲击情景下 2020—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20	6.14%	5.22%	4.29%	-0.46%	-1.38%	-2.31%
2021	4.98%	4.17%	3.46%	-0.40%	-1.22%	-1.93%

^① J. Fernald and H. Li, “The Impact of COVID on Potential Output,” FRBSR Working Papers, no. 2021-09, 2021.

续表 3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22	5.00%	4.36%	3.78%	-0.33%	-0.96%	-1.55%
2023	5.04%	4.60%	4.21%	-0.23%	-0.66%	-1.06%
2024	5.03%	4.69%	4.38%	-0.18%	-0.52%	-0.84%
2020—2024	5.24%	4.61%	4.02%	-0.32%	-0.95%	-1.54%
2025—2030	4.86%	4.84%	4.85%	-0.03%	-0.05%	-0.04%
2031—2035	4.36%	4.40%	4.47%	0.00%	0.04%	0.11%
2036—2040	3.71%	3.79%	3.90%	0.04%	0.12%	0.23%
2041—2045	3.18%	3.26%	3.38%	0.05%	0.12%	0.24%
2046—2050	2.90%	2.88%	2.90%	-0.01%	-0.03%	-0.01%

(三) 中美技术脱钩风险

长期来看，中美技术脱钩是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随着中美竞争博弈加剧，中美技术脱钩形势日渐显现，将在中长期内抑制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尽管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相比美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甚至在新能源技术、大数据、5G、量子计算等一些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在半导体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技术领域明显落后。

中美技术脱钩会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科技人员交流等渠道影响中国科技创新，进而作用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第一，贸易渠道。当前，就部分关键行业的零部件和资本品而言，中国仍主要依赖于从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进口。若美国联合新老盟友对中国“卡脖子”技术和关键设备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则短期内会导致中国技术创新速度减缓、部分产品生产受阻，长期内可能造成技术发展的“双轨化”。第二，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通过技术溢出、竞争效应、人才流动等方式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若中美技术脱钩使得该通道关闭，则中国企业向外学习的机会减少，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第三，科技人员交流渠道。科研创新需要科技人员相互交流，如此才能激发出最具前沿和创新性的想法。当前，美国对一些在美华人教授实施不公正对待，对中国留学生在专业和签证方面进行限制，这会减少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在中国的扩散和外溢，可能造成中国科技创新步伐放缓。

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渠道十分复杂。由于中国对美国的设备引进与技术学习、模仿主要通过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中国进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实现，因此本文仅考虑这两个因素对中国 TFP 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吸引美国 FDI 强度与中国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强度能解释中国 TFP 增速的比例约为 20%。

本文模拟了从 2022 年开始中美技术脱钩的三种情景：中美技术脱钩 1/4、中美技术脱钩 1/2 和中美技术完全脱钩，对应中国吸引美国 FDI 强度与中国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强度两个指标均分别下降 25%、50% 和 100%。表 4 显示，2022—2025 年间，中美技术完全脱钩会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 0.41 个百分点。同时，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呈现逐步扩大趋势。2046—2050 年，中美技术完全脱钩将导致中国 GDP 潜在增长率下降 0.62 个百分点。本文预测结果未考虑中美技术脱钩后，中国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方面的积极应对，因此可能高估了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表 4 中美技术脱钩情景下 2022—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22	5.23%	5.13%	4.94%	-0.10%	-0.19%	-0.38%
2023	5.17%	5.07%	4.87%	-0.10%	-0.20%	-0.40%
2024	5.11%	5.00%	4.79%	-0.11%	-0.21%	-0.42%
2025	5.05%	4.94%	4.72%	-0.11%	-0.22%	-0.44%
2022—2025	5.14%	5.04%	4.83%	-0.10%	-0.21%	-0.41%
2026—2030	4.71%	4.59%	4.35%	-0.12%	-0.24%	-0.48%
2031—2035	4.22%	4.08%	3.81%	-0.14%	-0.27%	-0.54%
2036—2040	3.53%	3.38%	3.10%	-0.14%	-0.29%	-0.57%
2041—2045	2.99%	2.84%	2.54%	-0.15%	-0.30%	-0.60%
2046—2050	2.75%	2.60%	2.29%	-0.16%	-0.31%	-0.62%

(四) “三大新因素”的综合影响

从“三大新因素”影响走势来看，^① 人口老龄化加速短期内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构成制约，反而会有一些的提振作用，但会在 2040 年以后持续拖累经济增长，且影响逐步增大；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未来 5 年，影响幅度在 1 个百分点左右，此后影响将快速减弱；中美技术脱钩会在长期持续制约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影响幅度在 0.5 个百分点左右。

从不同时期来看，“十四五”时期，“三大新因素”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1 个百分点，其中新冠疫情因素贡献约 0.7 个百分点，中美技术脱钩因素贡献约 0.3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很小；2026—2040 年“三大新因素”造成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其中中美技术脱钩因素贡献 0.5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因素会提振潜在经济增长率 0.2 个百分点；2041—2050 年“三大新因素”导致中国潜

^① 此处分别选取了人口低生育率情景（见图 2）、新冠疫情冲击的情景 2（见表 3）和中美技术脱钩的情景 3（见表 4）。

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约 0.8 个百分点，其中中美技术脱钩因素贡献 0.6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因素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且日益扩大，贡献约 0.3 个百分点（见图 3）。从能否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来看，“三大新因素”导致 2035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考虑“三大新因素”后，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 2.28 万美元，相比基准情景减少 0.15 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42 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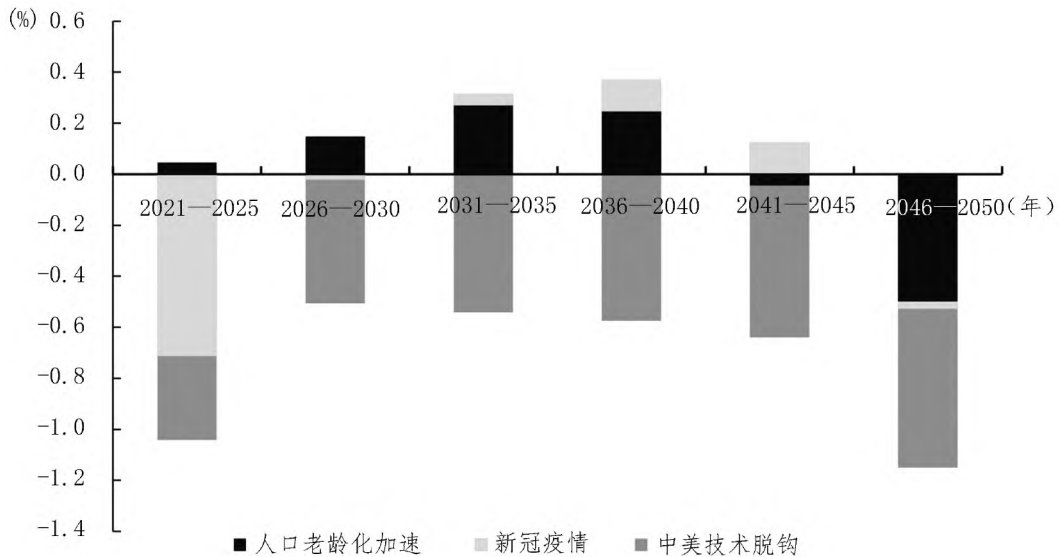


图3 “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净效应

从中美经济实力对比来看，在基准情景下，中国 GDP 将于 2031 年超越美国；考虑“三大新因素”情景下，中国 GDP 超越美国的时间推迟到 2033 年，^① 并且 GDP 增速在 2046 年之后低于美国。

五、增强历史主动，奋进现代化新征程

考虑“三大新因素”的情景分析显示，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 2.28 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2.42 万美元。这凸显出内外部环境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严峻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宿命”；相反，增强历史主动，深化改革开放，是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招。鉴于此，本文分别模拟了减税、提高 TFP、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情景，测算各项政策红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作用，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学理支持，增强对中国未来增长的信心。

^① 本文选取过去 10 年美国人均 GDP 增长率的平均值作为美国未来 30 年人均 GDP 潜在增长率，再结合联合国对美国人口增长率的预测值，计算出未来 30 年美国 GDP 潜在增长率。此外，本文还考虑了采用过去 20 年美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作为未来 30 年美国人均 GDP 潜在增长率的情形，发现结果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

(一) 减税激励企业投资

企业税率上升降低了净利润，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不利于资本积累。考虑到近几年中国大力开展了“减税让利”政策，受限于政府财政预算约束，实际可减税的空间显著缩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企业所得税占 GDP 比重从 2015 年的 3.94% 降至 2020 年的 3.59%，实际下降了 9%。为说明减税带来的“改革红利”，假设从 2022 年开始，企业税率分别减少 5%、10% 和 15%。这个假设隐含的前提是，由于税收发生变化，资本回报率在企业与税收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动，从而影响资本形成率和资本存量。除减税对投资产生的直接影响外，由于资本形成率具有一定的惯性，减税还能通过资本形成率的滞后项影响当期的资本形成率。因此，这项改革在短期和长期都将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

从减税政策的“改革红利”的大小和持续时间来看，减税带来的“改革红利”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减税效应预计在 2026—2030 年间达到最大，此后逐渐降低。表 5 显示，减税 5% 对“十四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明显的“改革红利”，达到 0.42 个百分点。在基准情景下，由于“人口红利”消失，2031—2035 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降至 4.35%，若生产税在现有基础上减少 5%，则这段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提高到 4.93%，高出基准值 0.58 个百分点，“改革红利”比较明显，2046—2050 年仍能维持 0.44 个百分点。由此来看，减税政策可继续成为提升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政策选项。

表 5 减税政策情景下 2022—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减税 5%	减税 10%	减税 15%	减税 5%	减税 10%	减税 15%
2022—2025	5.66%	5.81%	5.97%	0.42%	0.56%	0.73%
2026—2030	5.45%	5.66%	5.89%	0.62%	0.82%	1.06%
2031—2035	4.93%	5.12%	5.32%	0.58%	0.76%	0.97%
2036—2040	4.19%	4.35%	4.53%	0.52%	0.68%	0.86%
2041—2045	3.61%	3.76%	3.92%	0.48%	0.62%	0.78%
2046—2050	3.35%	3.48%	3.62%	0.44%	0.57%	0.70%

(二) 提高 TFP

TFP 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① TFP 的提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一方面，经过

^① 参见刘鹤：《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4 日，第 6 版。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明显缩小，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学习方式获得的后发优势日渐式微，叠加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技术打压，未来中国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自主创新和基础研究投入。另一方面，资源错配曾导致中国较低的 TFP 水平和较大的增长空间。^① 尹恒和李世刚研究发现，1998—2013 年，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平均达到 160%；通过消除省际扭曲、实现全国统一有效的大市场，总产出能够增加约 70%， “改革红利”十分丰厚。^② 但是，随着这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 TFP 增进效应开始递减。

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为特征，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 TFP。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日益显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元宇宙涉及的新技术为代表，体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预期将对中国 TFP 产生重要影响。参考 Lucas 对可比经济体的定义，^③ 以相对美国人均 GDP 指标而言，2019 年中国相对美国人均 GDP 大致相当于 1955 年的日本、1960 年的新加坡、1960 年的中国香港、1979 年的中国台湾和 1985 年的韩国。这五个可比开放经济体在随后 30 年 TFP 的平均增长率在 1.7%—2.5% 之间。由于基准情景采用的 TFP 增长率为 1.9%，本文假设从 2022 年开始，中国 TFP 能够在 1.9% 基础上分别提高 0.3 个百分点、0.45 个百分点、0.6 个百分点。

表 6 显示，2022—2025 年 TFP 提升政策产生的净效应分别达到 0.32 个百分点、0.49 个百分点、0.65 个百分点。同时，技术进步产生的红利呈递增趋势变化。2046—2050 年，各情景下的净效应可分别达到 0.5 个百分点、0.75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资源和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在逐步增大，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 TFP 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变得极其重要。而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提升 TFP 可以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表 6 提高 TFP 情景下 2022—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22—2025	5.57%	5.73%	5.89%	0.32%	0.49%	0.65%
2026—2030	5.22%	5.41%	5.60%	0.38%	0.58%	0.77%

① C. T. Hsieh and P. J. Klenow,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4, no. 4, 2009, pp. 1403-1448.
 ② 参见尹恒、李世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2 期。
 ③ R. E. Lucas,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 no. 1, 2009, pp. 1-25.

续表 6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31—2035	4.78%	5.00%	5.22%	0.43%	0.65%	0.86%
2036—2040	4.13%	4.36%	4.59%	0.46%	0.69%	0.92%
2041—2045	3.61%	3.85%	4.09%	0.48%	0.72%	0.96%
2046—2050	3.41%	3.66%	3.92%	0.50%	0.75%	1.00%

(三) 提升人力资本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提高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年限来实现，但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增加培训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类似于提升 TFP 的情形，本文选取了历史上与中国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东亚经济体，测算其当时未来 30 年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本文假定三种情景：从 2022 年开始，中国未来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分别在基准情景基础上提高 0.05 个百分点、0.075 个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种情景下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为选取可比经济体中对应时期中的最高值。

表 7 显示，提高人力资本政策可以促使“十四五”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上升 0.06 个百分点、0.08 个百分点和 0.11 个百分点。尽管该项政策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但却具有“递增性”。2046—2050 年，提高人力资本的政策效应可以达到 0.08 个百分点、0.13 个百分点和 0.17 个百分点。若考虑人力资本对 TFP 的作用，则该项政策的作用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提升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手段。

表 7 提高人力资本情形下 2022—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22—2025	5.30%	5.33%	5.35%	0.06%	0.08%	0.11%
2026—2030	4.90%	4.93%	4.97%	0.07%	0.10%	0.13%
2031—2035	4.43%	4.46%	4.50%	0.07%	0.11%	0.15%
2036—2040	3.75%	3.79%	3.83%	0.08%	0.12%	0.16%
2041—2045	3.22%	3.26%	3.30%	0.08%	0.12%	0.16%
2046—2050	3.00%	3.04%	3.08%	0.08%	0.13%	0.17%

(四) 提高劳动参与率

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15—64 岁）人口数量在 2016 年达到峰值，此后缓慢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要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前提是参与就业。因此，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形成的劳动力供给减少问

题，进而促进潜在经济增长。假定从 2022 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提高 1 个百分点、3 个百分点和 5 个百分点。

表 8 显示，2022—2025 年提高劳动参与率政策可以推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上升 0.09 个百分点、0.26 个百分点和 0.44 个百分点。但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产生的“改革红利”会逐步减弱，到 2046—2050 年该项政策效应降至 0.03 个百分点、0.09 个百分点和 0.15 个百分点。从上述数值及其变化来看，围绕劳动参与率的改革政策不是我们可以长期主要依赖的政策选项。

表 8 提高劳动参与率情景下 2022—2050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			净效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2022—2025	5.33%	5.51%	5.68%	0.09%	0.26%	0.44%
2026—2030	4.91%	5.05%	5.20%	0.07%	0.22%	0.36%
2031—2035	4.41%	4.53%	4.64%	0.06%	0.18%	0.29%
2036—2040	3.72%	3.81%	3.89%	0.05%	0.14%	0.23%
2041—2045	3.17%	3.24%	3.31%	0.04%	0.11%	0.18%
2046—2050	2.94%	3.00%	3.06%	0.03%	0.09%	0.15%

(五) 多项政策组合效应

尽管单项改革举措对提高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政府可采用上述政策组合的方式扩大“改革红利”。考虑到当前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仅以减税、提高 TFP、提高人力资本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低改革力度情景为例（见表 9）。综合来看，减税和提高 TFP 的政策对潜在经济增速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这两项政策可使 2022—2025 年、2026—2030 年、2031—2035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 0.75 个百分点、1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2046—2050 年仍可达到 0.93 个百分点。若再配套实施提高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参与率等政策措施，则 2022—2025 年、2031—2035 年和 2046—2050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能分别提高 0.89 个百分点、1.14 个百分点和 1.05 个百分点。

表 9 2022—2050 年政策组合的“改革红利”

	2022—2025	2026—2030	2031—2035	2036—2040	2041—2045	2046—2050
税率下降 5%						
	0.42%	0.62%	0.58%	0.52%	0.48%	0.44%
税率下降 5%，TFP 增加 0.3%						
	0.75%	1.00%	1.00%	0.98%	0.95%	0.93%
税率下降 5%，TFP 增加 0.3%，人力资本增速上升 0.05%						
	0.80%	1.07%	1.08%	1.05%	1.04%	1.02%

续表 9

	2022—2025	2026—2030	2031—2035	2036—2040	2041—2045	2046—2050
税率下降 5%，TFP 增加 0.3%，人力资本增速上升 0.05%，劳动参与率提高 1%						
	0.89%	1.14%	1.14%	1.10%	1.07%	1.05%

综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景下，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将使得未来 30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年均可提升 1 个百分点左右，不仅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并且好于基准情景，可以确保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引入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最新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测算了中国 2021—2050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对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动力分解。在基准情景基础上，本文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技术脱钩等“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情景下，中国“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 5% 以上，2035 年人均 GDP 为 2.43 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2.42 万美元的水平；（2）考虑“三大新因素”情景下，“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 1 个百分点，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2.28 万美元，比基准情景减少 0.15 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景下，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未来 30 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可提升 1 个百分点左右，能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确保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考虑到需求面的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现实经济增长率。尽管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但需求侧决定了潜在增长率能否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需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另一方面着力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促使实际增长率逐步达到潜在增长率。

首先，重视资本积累，扩大有效投资。资本积累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动力，要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以及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一是优化税制结构，推动实施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坚持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

^① 具体而言，综合考虑“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和四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对冲作用，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 2.63 万美元，超出中等发达国家标准 0.21 万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将在 2030 年超越美国；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 2022—2050 年间将持续高于美国。

减税相结合，扩大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覆盖面，聚焦“专精特新”完善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投资。二是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促进公共产品投入，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三是扩大投资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基础设施优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领域的投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过高的房价挤压实体企业的非房地产投资。四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其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二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积聚力量攻关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核心技术；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三是深度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最后，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适应不同类型人才的发展需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支持老年劳动力人群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缩小劳动力供需缺口。同时，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提高机器替代人工的比重，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缺口。五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责任编辑：梁 华〕

ABSTRACTS**Prospects for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Zhang Xiaojing and Wang Yong • 4 •*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chieving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s attained further prominen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owth accounting plus human capital, we examine the impact on China's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the "three new factors:"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eing,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of China and the US. The findings of our assessment of the "reform divide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olicies show that in the baseline scenario, China will have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f more than 5 percent, resulting in a GDP per capita of US\$ 24,300 in 2035, that is, China will have reached the medium-sized developed country level of US\$ 24,200 per capita. Once the "three new facto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growth rate in the same period decreases by one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and China's GDP per capita in 2035 will be US\$ 22,800, which is US\$ 1,500 lower than the baseline scenario and below the level of medium-sized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corpor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will raise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by around one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over the next thirty years, effectively offset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three new factors" and enabling China to steadily achieve its vis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al Forms in a Changing World an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Xiang Jiuyu • 26 •*

Civilizations are time-bound and constantly in flux. Historically, changes in the world have driv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al forms.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life, the restructuring of world politics, the reshaping of values and ideals,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are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future narra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on Western modernity,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world history, which reflects on and transcends the "paradox of civilization" brought about by capitalism. The intellectual system marked by 21st century Marxism has shaped the deep spiritual structur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t a divid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 204 •